

移民还是留守: 我们为何纠结

不如人意的营商环境让部分企业家心灰意懒、身心俱疲, 甚至一部分人试图以双重国籍的方式实现自我保护

■ 本报记者 张艳蕊

2012年底, 浙江商人郭强从新加坡匆匆回国时窝了一肚子火。他的护照签证又到期了, 而新加坡分公司的注册事务还没有办完, 剩下的事情只能交给他的儿子了。虽然他对儿子的办事能力并不太放心, 但儿子的移民手续已经办好, 新公司正是以他儿子的名字注册的。

对于郭强来说, 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被护照牵着走的情况了, 但这次他忽然有了一种疲倦感。因为他知道, 回到浙江的公司总部, 他还要处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——财税部门的税务罚款。这项罚款要追溯到3年前他的企业所享受的一项国家税收优惠政策。

心灰意懒者

“本来是政府主管部门工作失误, 板子却打在了企业身上, 我不得不频繁回来配合政府为自己申诉。”郭强无奈地对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说。

2008年, 郭强的公司曾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他还清楚记得, 当时公司所在的高新区科技局通知他去拿申请表, 并告诉他如果通过了, 能享受到10%的企业所得税优惠。以郭强公司的实力顺利通过, 2011年复查再次通过。但是没想到, 这次他还在国外, 就接到公司副总的电话, 说财税部门检查出他们当年申请时有专家打分过高, 因此, 要撤销高新技术企业资格, 同时向税务机关一次性补缴相关税款。

而让郭强最头疼的是, 与享受优惠政策那两年公司效益大增相反, 近两年, 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, 国外订单巨减, 公司近期的利润很低, 目前正在办理贷款, 此事一出, 公司授信额度肯定会受影响。

郭强目前仍纠缠在补缴税款申诉中。最近一次与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通话时他有些心灰意懒: “一次性让我们补缴600多万元, 这不是想把企业搞死吗? 我们又不是靠骗取优惠政策取得发展的。算了, 不行我就让他们罚吧, 大不了我把房子卖了, 全家移民。反正新加坡那边的公司也快弄好了。”

身心俱疲者

与郭强的民营企业性质不同, 同是浙商的沈钟的公司股份构成比较复杂: 一家央企持有其28%的股份, 另一家持有其26%股份的企业原来属美资, 后又变更为港资。因此, 公司的所有账务管理都要涉及境外资金监管。

作为阀门生产企业行业龙头的董事长, 沈钟现在除了公司战略规划、流程再造、绩效考核, 其他都不管了, 但他依然感觉这两年特别累。

案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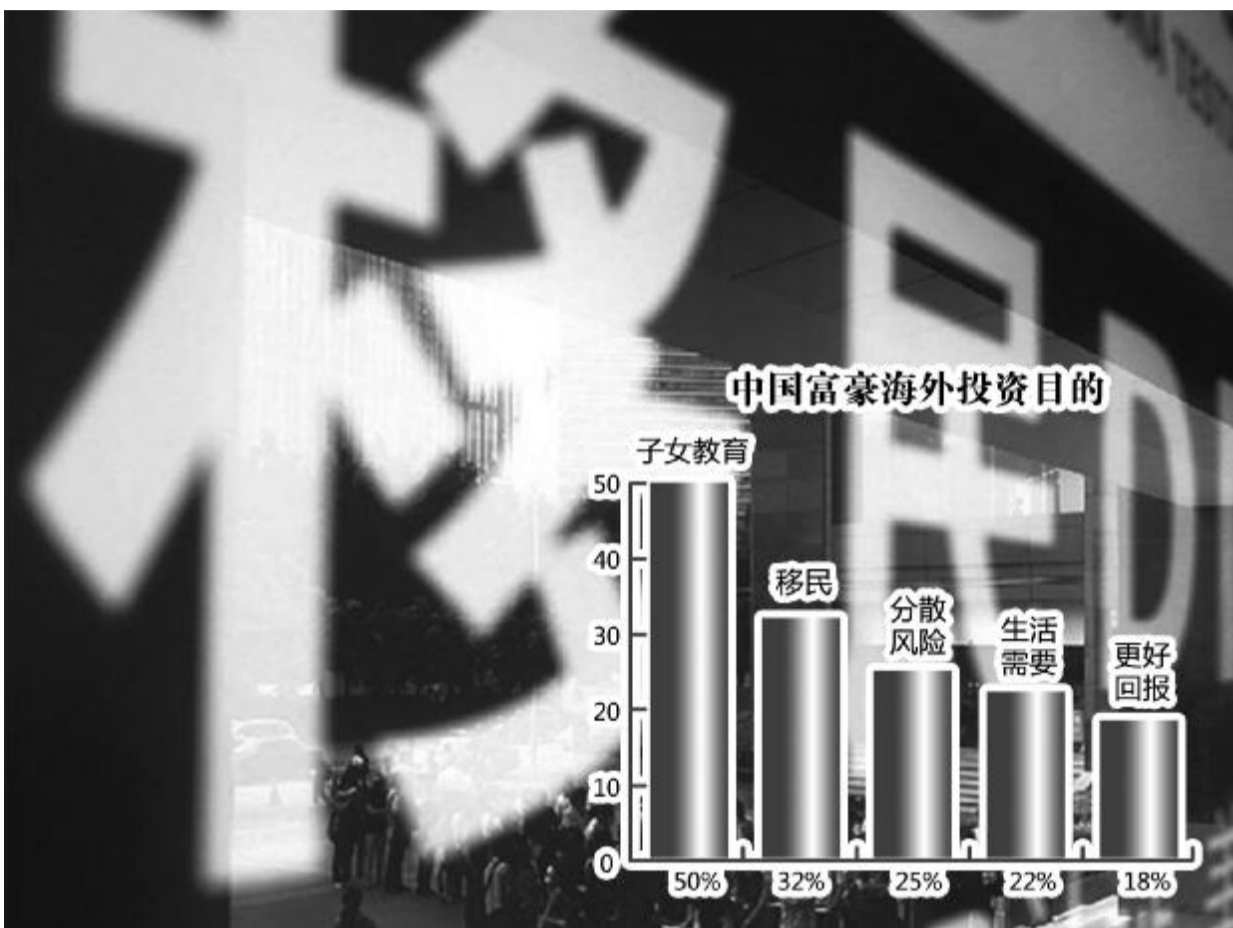
权利经济逼走民企精英

■ 本报记者 鲁扬

当前, 国内资本外流严重, 民营企业移民海外的热潮还在持续。有专家认为, 资本外流的原因很多, 但最大的问题不是政策问题, 也不是资金、技术和产品问题, 而是权利经济下腐败因素导致的市场不公平问题。

正在办理移民手续的一位民营企业企业家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说, 改革开放让他这个偏远地区的普通教师离开讲坛投身商海, 用了20多年的时间, 完成原始积累。目前, 他的企业已经具备一定规模, 资产过亿。

“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像鲁冠球、王健林、柳传志一样的大企业家, 希望我的企业员工都有好的归宿, 但这实在太难了! 我今年只有42



王利博制图

按照阀门行业的平均水平, 年人均销售额目前在30万元左右, 而沈钟的企业达到了93万元,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3倍还多。

近几年, 由于黄铜涨价, 沈钟的企业受到很大影响。“我们制造成本中大约70%是原材料, 利润率只有6%—7%。虽然不能和其他行业相比, 但我们比较稳健。”沈钟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。

沈钟的“累”还来自于政府对于制造行业的重视度不够: “全国上下不重视制造业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德国、日本的发达都是建立在重视制造业基础之上, 中国却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第三产业中。制造业不兴旺, 第三产业会有前途吗?”

不过他很清楚, 他的呼吁没有用。“因为从现实来看, 制造业带动GDP太少了, 所以都不重视, 这是必然的, 制造业兴旺需要长期的投入。”沈钟的另一种“累”来自财务监管方面。

“我们公司因为有境外投资, 所以比央企的资金监管还严。”在沈钟看来, 目前已经严到“正常的事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了”: “我们这种行业需要很多先进技术, 因此每年的研发投入很大, 但却无法说出准确数字, 因为我们的产品、设备材料、工艺等好多项目都是和国外合作完成的。但是, 按照现行的财税政策, 按正常渠道我是没办法走账的。同国外公司合作, 索要合乎中国标准的发票很难, 所以我们只能变通, 研发、设计等费用只能通过产品买卖的方式补给对方。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 如果按照正常手续审批, 估计要办到猴

年马月了。”

“我现在是一个企业的老总, 到国外请客户吃饭回来是报不了账的。”沈钟苦笑着说, “走正规渠道, 国外的发票中国财务制度不承认。按程序我要向外汇管理局报批, 你不知道外汇管理局批下来有多难。外汇管理局要问我: 你怎么请客花了这么多钱啊?”

沈钟的企业1992年就曾在泰国办厂。他说他完全能体会郭强的遭遇。“我事情还没处理完, 签证日期到了, 我还得回来, 回来再办签证, 留下的事怎么处理? 所以说中国企业想走出去太难了。”

门里门外者

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个特殊的阶层, 他们始终是中国人, 但同时也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。

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自动化专业的周雪, 是一家矿山开采机械公司的总经理。她有一个24人组成的团队, 这个团队是从原来公司剥离出来的。带着这个团队, 她承接了两个大型有色金属矿的开采项目, 她本人则很快跃升到富人阶层。

富起来之后她马上联系了加拿大投资移民。她说移民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孩子教育问题, 另外她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: “我怕有一天政策一变, 我辛辛苦苦、风餐露宿挣来的钱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”

周雪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。山西籍民营企业家卫宪法, 一个靠自学而在国内铝矾土行业小有名气的“土专家”, 经过多年积累身价上亿。6年前,

卫宪法遭当地民政局官员非法拘禁后致企业易主, 亿元资产被零元转让。与此同时, 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安全与移民话题再次被热议。此前, 俏江南董事长张兰悄然注销户口、移民加魁北克国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
“加拿大允许双重国籍,”周雪偷偷告诉记者, “我现在还保留着中国国籍。”周雪的公司目前在两国都有施工项目。

温庆的情况和周雪有些相似。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企业家。当时小有积蓄的他到了英国, 近20年的打拼始终没有太大起色。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, 温庆等一批企业家又被吸引回来, 他是带着包括前劳斯莱斯副总裁的投资回国创业的。在拥有英国国籍的同时, 温庆还保留着中国国籍。

目前, 温庆的公司节能环保领域已经是领先水平, 但他最不适应的是某些地方官员的作风。

“有一次我们去陕西谈一个项目, 当地的一个官员来了, 看了我的项目展示, 连具体价格都问了。结果, 第二天, 他的助理来了, 说这个领导有一个公司, 可以给我一个200万元的合同, 直接问我提成是多少?”温庆无奈地冲记者笑笑: “我是做合同能源管理的, 能挣多少钱, 是基于能省多少钱, 给他提成我怎么做账啊? 又怎么向我的股东交代?”

后来, 温庆公司的产品一直无法进入那个地区。

如今, 周雪和温庆们都在观望中, 因为他们的主要市场都在中国。(应被采访者要求, 文中涉及企业家均为化名)

企业家移民潮来袭

(上接第一版)

因此, 移民能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企业家免签证的便利性。

而且, 法人代表国籍变更后, 有望获得税收、用地、用工等政策便利, 甚至融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, 移民对企业家的诱惑力越来越大, 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时期, 靠移民争得喘息机会显得尤为重要。

张莹向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介绍, 移民国外一般分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, 民营企业大多选择投资移民。张莹承认他们所办理的成功移民案例中, 很少有真正去加拿大做生意的, 大多数都是在国内继续经营。虽然花费不菲, 但因“出口转内销”后, 能享受到此前难以奢求的“超国民待遇”, 移民对民企的诱惑实在难挡。

另外, 移民也成了曲线融资的捷径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为企业上市而移民岛国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。

1月19日, 致公党江苏省委委员、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提交提案, 建议公开中国富人财产及国籍信息。陈光标表示: “现在有钱人移民的很多, 在国内赚钱以虚假协议转到国外, 这样的现象也很多。比如, 在国外订了一个设备要100万美元, 一些人在国外注册虚拟公司, 可以把这笔金额做到1000万美元, 剩下的900万美元就被合理、合法‘洗白’了, 打‘擦边球’的虚假投资现象比较严重。”

不安全

著名企业家冯仑在去年曾有一句调侃的话, 让很多企业家笑出眼泪: “有人说中国企业家为啥最近老讲体制的问题? 因为政府的手老在我怀里乱摸, 不能不说, 又不能乱说。”

中国企业家面对政策的不确定性, 面对推倒重来式、秋后算账式的政策, 不安全感正如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悬在头顶。

面对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的采访, 很多企业家表示: 对于随时可能莫名而来的处罚, 企业不敢说, 但不能不说, 又不能乱说。政府的手有时候伸得过长, 监管部门投入了超额的精力、财力来监督, 并有些冤枉过正, 这样会让原本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企业遭受重创, 从此, 企业的信心指数会严重受挫, 最终企业家可能会选择移民来逃避。

1月15日, 胡润发布的报告称, 对当前经济仅有25%的企业家“非常有信心”, 三年前为56%, 对经济没有信心的企业家由三年前的1%上升到今年的9.4%。

福建某律师事务所邢律在接受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采访时透露, 目前一些富豪离婚“净身出户”的背后, 很可能是为其全家移民做好了“财产转移风险规避”。邢律律师认为, 做出如此痛苦的选择, 恰恰说明了企业家内心的不安全感, 他认为应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企业, 要允许企业在问题中发展, 政策的制定, 要有包容性, 这样才能给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。

不幸福

在采访中, 很多企业家向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提到了自己的不幸。一位企业主甚至告诉记者, 在过去的2012年春节, 他是被工头儿挟持到办公室度过的, 原因是政府所欠工程款结不回来, 以致无法付清工人工资。“工人还能冲我闹闹, 我敢冲政府闹吗? 以后的活儿还想不想做了?”

其实, 在面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、潜规则, 企业家群体已经成了“斯德哥尔摩”症候群。心理学所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亦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, 是指绑架案件的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同情、惧怕等情绪, 于是反过来配合、甚至帮助、保护犯罪者。对于权利寻租、不公正待遇, 大多数企业家因此选择了忍耐、沟通。

上海市青年创业基金会副秘书长、北京盈科(上海)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士举在接受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采访时表示了担忧: “中国企业为什么长不大? 我接触的企业家经常说, 专家别给我讲下一步政府应该怎么做, 而是要告诉我下一步政府会出什么政策。政策的出台不连续性, 抽屉里、口袋里出台政策的不适应性, 再加上秋后算账或者推倒重来, 都让企业生存艰难。”

张士举认为, “法不溯及既往”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。不应该用今天的规定去约束昨天的行为, 政策制定也应不溯及既往。但现在很多企业在现实中经常面临秋后算账式的处罚, 这是影响企业家信心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当然, 面对越来越困难的经营环境, 很多企业家也在选择观望甚至接受挑战。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认为, 聪明的企业还是要把自己的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更为牢靠。

刘积仁主张企业家应该积极面对现实, “我不认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会一下子达到我们理想的那么好, 我们低成本竞争的能力永远不会再回去了, 现在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, 我们原来羡慕的富人现在越来越变成穷人, 现在他们在期待我们买他们的东西, 这个格局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。企业生存的基本道理就是冬天能活, 下雨能活, 困难能活, 有钱能活, 没有钱也能活, 而这种活需要企业有更长远的发展战略, 而不是靠机会, 靠别人给你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。”

链接

调查显示: 中国上层社会对移民最感兴趣

美国国土安全部(DHS)截至2012年4月15日的数据显示, 2011年中国移民美国人数增长1.6万。DHS称, 2011年发放绿卡总数超过106万, 其中向中国人发放8.7万。

墨西哥、中国和印度仍是移民美国数量最多的国家。2011年中国移民占全美移民人数的8.2%, 同比增加1.4个百分点, 移民美国人数增加的只有中国、古巴和越南三国。

美国公民与移民事务局(USCIS)称, 2010年1885位投资移民申请人中772人来自中国。美国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(1585万美元)。

贝恩公司《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》称, 中国上层社会对移民最感兴趣, 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富人大约27%已完成移民, 另有47%表示正在考虑移民。

在106万新永久居民中, 大多数(55%)已经住在美国。